

被误读和夸大的“伪命题”¹

——从鲁迅书简看他与林文庆之间的“矛盾”

严春宝 海南师范大学 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

鲁迅虽然在厦门大学只呆了一百余天，但却留下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历史谜团，其中他与当时厦大校长林文庆博士之间的所谓矛盾与冲突，就是一个长期困扰学者们的问题。然而，事实上这是一个被误读和夸大的伪命题：在鲁迅和林文庆之间，远没有爆发如学者们想象中那样激烈的冲突。导致鲁迅不能在厦门大学久留的根本原因，实质上与林文庆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联，因而，鲁迅的离去，实不应成为妨碍后人正确评价林文庆的一块顽石。

关键词：鲁迅 林文庆 思想冲突

1 本文系中国教育部2010年规划基金项目：“林文庆儒学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A7200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鲁迅（1881—1936）虽然在厦门大学只呆了一百余天，但却留下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历史谜团，其中他与校长林文庆博士（1869—1957）之间的所谓矛盾与冲突，就是一个长期困扰学者们的问题。海外研究林文庆的学者和中国研究鲁迅的学者，似乎都很喜欢强调鲁迅与林文庆在厦门大学期间的所谓矛盾与冲突。传统的观点往往是基于林文庆与鲁迅之间思想理念的不同（一个尊孔、一个要打倒孔家店），而想当然地预设了这样的结论：鲁迅之所以要离开厦门大学，是因为他和林文庆之间思想上的冲突与矛盾！事实果真如此吗？由于林文庆并没有遗留下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明，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对鲁迅有关著述的分析及相关史料的佐证，复原出一个尽可能合乎历史、也合乎逻辑的答案。

一、鲁迅与林文庆之间关系探析

《鲁迅日记》中曾先后5次提到林文庆。《鲁迅日记》首次提及林文庆是在1926年11月25日：“午林梦琴邀午餐”；后面四次提到林文庆都是在1927年的1月份，也就是鲁迅提出辞职之后：4日：“上午林文庆来”；9日：“午林梦琴饯行，至鼓浪屿午餐，同席十余人。”；13日：“午林梦琴饯行于大东旅馆，同席约四十人。”最后一次是15日：“上午寄林梦琴信再还聘书。”日记极为简单，我们无法从中获得很有价值的信息。

在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中，对林文庆的记录稍微多了一些，鲁迅至少先后在九封信中直接或间接提到林文庆。由于鲁迅在其生前编订出版《两地书》时，曾对“原信”进行过删减、修改，导致《两地书》和“原信”中提及林文庆的时候出现了个别

不同的说辞。下面就针对《两地书》和“原信”²中事关林文庆的部分内容进行必要的分析与说明。

在志为“九月二十八日夜”³的信中，鲁迅首次提及林文庆。《两地书》和“原信”中文字基本一致：“玉堂对于国学院，不可谓不热心，但由我看来，希望不多，第一是没有人才，第二是校长有些掣肘（我觉得这样）。”鲁迅特意在括号中加以注明：“我觉得这样”，显示出这仅仅只是鲁迅个人的感觉和揣测，并没有多少事实上的依据；后退一步来说，即使鲁迅的猜测属实，林文庆确有从中掣肘，这在鲁迅看来也只是影响国学院发展的第二位因素。那么，林文庆本人对国学院的真实态度到底又是怎样的呢？先看林文庆自己的表白：“鄙人来校之后，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此次特组织国学研究院，聘请国内名人，从事研究，保存国故，罔使或坠。”⁴林文庆并非空有言辞而没有行动，事实上，在厦大成立国学研究院一直是林文庆的一个既定目标。早在1925年下半年，林文庆就已着手筹划成立国学研究院，在12月份成立了国学研究院筹备总委员会，自己亲任主席，并初步拟定了《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大纲》，只是后来由于南渡新加坡，才使得筹备工作被迫暂时中断。⁵很显然，国学院的筹备成立与林文庆息息相关，如果没有林文庆的大力支持，国学研究院几

2 本文所引《两地书》之内容，均载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鲁迅全集》第七卷，1948年第三版。本文所引鲁迅“原信”之内容，均载于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3 鉴于《两地书》和《两地书·原信》在排列次序上并不相同，为方便读者查阅原文，本文一律按照鲁迅写信时间标注引用来源。

4 转引自洪俊峰，《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史迹》，厦门大学，2006年。

5 参见严春宝，《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页152。

乎是不可能成立的。因而，从林文庆对国学研究院不遗余力的支持来看，鲁迅所谓“校长有些掣肘”的猜测是不成立的。

在志于“十·四，夜”的信中，鲁迅第二次提到林文庆。《两地书》和“原信”中文字亦基本一致：“此地总无法想，玉堂也不能指挥如意，许多人的聘书，校长压了多日才发下来。校长是尊孔的，对于我和兼士，倒还没有什么，但因为花了这许多钱，汲汲要有成效，如以好草喂牛，要挤些牛乳一般。”林文庆为何要扣压“许多人的聘书”？鲁迅没有交代，我们无从得知事件的真相或扣压的原因或扣压聘书是否与学校行政手续有关或与林文庆本人有关。因而对此不予置评。此处让人感兴趣并值得特别关注的一点是：这是鲁迅首次提到林文庆的尊孔！然而，从鲁迅以平淡的语气说林文庆的尊孔“对于我和兼士，倒还没有什么”上来判断，林文庆的尊孔，显然并没有引起鲁迅的特别反感，反倒是对林文庆急功近利的做法颇有微词。既然鲁迅并没有表现出如后人期待中所应有的反感，那么，这件事自然也就不至于影响到鲁迅的去留。可以说，至少到此为止，在鲁迅和林文庆之间尚未形成如后人所谓的两人之间思想上的矛盾与冲突。

在志于“十月十六日之夜”的信中，鲁迅第三次提到林文庆。《两地书》和“原信”中的文字只字未改、完全一致：“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这里就是如此胡里胡涂。”尽管这已是第二次说“校长是尊孔的”了，但在鲁迅那平和、甚至些许无奈的语气中，似乎依然没有表现出后人期待中应有的愤怒。相信所有的研究者都不会忘记这次演说，且往往都过分强调鲁迅和林文庆相冲突的一面，但学者们似乎都忽略了极为重要的一点：针对这次演说的两个内容，林文庆和鲁迅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交集存在的：鲁

迅提倡“少读中国书”固然让林文庆感到难堪，但鲁迅主张要做“好事之徒”的想法却是与林文庆不谋而合的，所以林文庆才会接着鲁迅的演讲，进一步发挥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这说明：在林文庆和鲁迅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一面，同时还有相容、相通的地方。事后鲁迅对于林文庆腰斩他的演讲词也并没有表现出过激的反应：看在鲁迅的眼中，林文庆再不好，也不过就是一个多少有点儿糊涂，因而让他觉得有些好笑的孔教徒罢了。

在《两地书》中志为“十，八夜”而“原信”中则志为“十八，夜”的信中⁶，鲁迅第四次提到林文庆。《两地书》和“原信”中分别在两个地方先后提到林文庆，内容大同小异：“国学院也无非装门面，不要实际，对于教员的成绩，常要查问，上星期我气起来，就对校长说，我原已辑好了古小说十本，只须略加整理，学校既如此着急，月内便去付印就是了。”“下午有校园恳亲会，我是向来不到那种会去的，而一个同事硬拉我去，我不得已，去了。不料会中竟有人演说，先感谢校长给我们吃点心，次说教员吃得多么好，住得多么舒服，薪水又这么多，应该大发良心，拼命做事，而校长如此体贴我们，真如父母一样……”虽然鲁迅并没有清楚交代国学院对教员成绩的查问到底授意于谁，但显而易见，鲁迅是将国学院的查问归罪于林文庆了，因而生气。至于恳亲会中因林语堂二哥林玉霖演说而提到校长林文庆，以至于惹得鲁迅大怒而直“要跳起来”，如果因此而导致鲁迅对林文庆不满的话，我们也只能说是无辜的林文庆遭受了池鱼之殃吧？

6 按：从“原信”的排列次序看，此信的具体写作时间当为十一月十八日——作者。

在志于“二十五日之夜”的信中，鲁迅第五次提到林文庆。《两地书》中说：“近日因为校长要减少国学院豫算，玉堂颇愤慨，要辞去主任，我因劝其离开此地，他极以为然。今天和校长开谈话会，我即提出强硬之抗议，以去留为孤注，不料校长竟取消前议了”。“原信”中，除个别字稍有不同外，还多出了一句话：“近日因为校长要减少国学院豫算，玉堂颇愤慨，要辞主任，我因进言，劝其离开此地，他极以为然。我亦觉此是脱身之机会（此句在鲁迅编辑的《两地书》中被删除了——作者注）。今天和校长开谈话会，乃提出强硬之抗议，且露辞职之意，不料校长竟取消前议了”。这是鲁迅与林文庆之间最为直接的一次冲突，但如果考虑到此事发生前后的因果关系的话，则鲁迅的这次当面抗议，与其说是对林文庆个人的不满，倒毋宁说是鲁迅出于同情林语堂辛苦维持国学研究院的一个打抱不平的义举，因而，似乎不宜将之视为是鲁迅和林文庆之间的个人冲突，自然也就更不可能是思想观念上的冲突了。除此之外，请特别注意“原信”中多出的这句话：“我亦觉此是脱身之机会。”我们是否可以做如下之理解？鲁迅急欲离开厦大而苦于没有充足的正当理由，因此不惜制造并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借动员林语堂离开厦大之机，达致自己脱身之目的？如果此说能够得到逻辑上的验证，那么鲁迅此次与林文庆之间的所谓“冲突”，显然就不能一般性的理解成是他们私人之间的恩怨，而被蒙在鼓中的林文庆，就更不可能成为促使鲁迅离开厦大的原因了。鲁迅在时隔七年之后编订出版《两地书》的时候，为什么要刻意将“我亦觉此是脱身之机会”删除？个中原因是否有助于我们做出上述理解？相信读者自有明晰。另外，在鲁迅“提出强硬之抗议”后，“不料校长竟取消前议了”，这是否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林文庆绝非蛮不讲理、冥顽不化的顽固派，反倒显示出了他的虚怀若谷和从善如流呢？

在志于“十二月十二日”的信中，鲁迅第六次提到林文庆。《两地书》和“原信”并无不同：“又恭听校长辈之胡说至十一时。”虽然中间鲁迅曾经“溜出会场，再到代办所去一看，果然已有（许广平的）三封信在”，虽然明言林文庆是“胡说”，但至少还是在鲁迅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否则，依鲁迅爱憎分明的性格，他哪里会坚持听到十一时？恐怕早就跳起来大发其难了吧？

在志于“十二月二十四日灯下”的信中，鲁迅第七次提到林文庆。“原信”中是这样说的：“国学院是不会倒的，不过是不死不活，一班江苏人正与此校相宜，黄坚与校长尤洽，他们就会弄下去。后天校长请客，我在知单上写了一个‘敬谢’，这是在此很少先例的，他由此知道我无留意，听说后天要来访我，我当避开。”从中看出，林文庆对于鲁迅的诚意挽留，也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事隔七年之后，《两地书》中对林文庆的宴请及“当避开”这样的话不再被提及：“国学院是一时不会倒的，不过不死不活，‘学者’（指顾颉刚）和白果，已在联络校长了，他们就会弄下去。然而我们走后，不久他们也要滚出的。为什么呢，这里所要的人物，是：学者皮而奴才骨。他们却连皮也太奴才了，这又使校长看不起，非走不可。”当林文庆的“请客”和“来访”之举在此被替换成了校长看不起“现代评论派”！我们是否可以从得出这样的结论：林文庆的形象再不讨好，但在事后已然平静下来的鲁迅看来，他至少还不是“敌人”阵营中的人，而且因“校长看不起”“现代评论派”的人，这是否更暗示或意味着：林文庆是比较地靠近鲁迅这一边呢？

在志于“一月二日下午”的“原信”中，鲁迅第八次提到林文庆。鲁迅在是次信中两个地方提到林文庆：“因为我所不满意的是校长，所以无可调和。”“校长是决不会改悔的。他对我虽然很恭敬，但我讨厌他，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

不知出于怎样的目的，鲁迅在编订出版《两地书》的时候并未将此信收入。由于鲁迅在信中并未说明因何而对林文庆不满，以至于“无可调和”？所以我们无从得知鲁迅对林文庆不满的真实原因之所在，但如果考虑到鲁迅此信写于厦大学潮渐起之时，是在鲁迅向厦大校方提出了正式辞职书之后，如果再联系到此前鲁迅对厦大绝望的态度：“厦大是废物，不足道了。”（“原信”：十二月廿九日）在当时谣言满天飞的情况下，鲁迅出于对厦大的不满，因而对作为校方代表、一校之长的林文庆提出严厉的指责，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导致鲁迅讨厌林文庆的其中一个理由，是鲁迅“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其实，林文庆岂止是像英国人，按当时的法律制度，林文庆作为一个在英属殖民地出生的土生华人，他持有英国护照，也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英国人，而且，从林文庆所接受的教育背景来看，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一些英国绅士的特征，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难道仅仅因为林文庆像英国人就该让鲁迅讨厌吗？鲁迅所给出的理由，是不是有点儿牵强、有点儿令人费解？甚至，有些无厘头？如果照此推理，是否也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因为鲁迅“他不像英国人，像中国人”，所以，林文庆就该对鲁迅“很恭敬”？而且，对鲁迅“恭敬”难道也有错吗？在这“恭敬”的背后，难道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矛盾与冲突？作为一校之长的林文庆，能对属下一个教授显示出“很恭敬”的态度，到底是礼贤下士，还是别有用心？相信读者自有明断。

在志于“一月十七日”的信中，鲁迅第九次提到林文庆。“原信”中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侦探性的学生跟住我。这人大概是校长所派，侦探消息的，因为那边的风潮未平，他怕我帮助学生，在广州活动。”既然鲁迅说“大概是校长所派”，就表明这只是他自己的揣测。事隔多年之后，或许鲁迅自己也觉得对林文庆的这种揣测缺乏依据，因而，在出版《两地书》的时候，这

句话被改成了“此人大概是厦大当局所派”。从“校长”到“厦大当局”，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对林文庆的猜疑与指责。

在鲁迅离开厦门的前一天，也就是1927年1月15日，针对林文庆的一再挽留，鲁迅给林文庆写了一个便函：

“文庆先生足下：

前蒙惠书，并囑刘楚青先生辱临挽留，闻命惭荷，如何可言。而屡叨盛饯，尤感雅意，然自知薄劣，无君子风，本分不安，速去为是。幸今者征轮在望，顷即成行。肃此告辞，临颖悚息。聘书两通并还。

周树人 启

一月十五日”

不管鲁迅是如何以自嘲（？）暗讽（？）或许几分戏谑的语气（？）说出上述话语，但鲁迅至少还能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客气。

鲁迅最后一次提到林文庆应是在《海上通信》中：“校长林文庆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做过一本讲孔教的书，可惜名目我忘记了。”⁷ 其实，鲁迅是拥有《孔教大纲》这本书的，⁸ 虽没有证据显示鲁迅曾通读过该书，但可以断定他是翻阅过的，鲁迅故意不说出书名，只不过是為了彰显自己与林文庆“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是说，鲁迅这么做的目的是

7 《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418。

8 《鲁迅日记》1926年8月5日中有“得顾颉刚信并《孔教大纲》一本”这样的记载。

有意将自己与林文庆进行切割：你依旧去读你的中国书，而我则继续做我的好事之徒，大有井水不犯河水之意。此外，《海上通信》中还提到各种谣传，涉及到林文庆的有“排挤说”：“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我到厦门，原是用来捣乱，并非豫备在厦门教书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没有辞掉。”鲁迅只说是“听到的”，在当时谣言满天飞的情况下，林文庆到底有没有说过这些话？除了鲁迅的一面之词外，一切都不得而知，而林文庆本人在当时却是予以公开否认的。

通过上述对鲁迅关于林文庆的有限记载的分析，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鲁迅对林文庆的确并没有多少好感，但从鲁迅自始至终甚为客气的说话语气中（相较于他对“现代评论派”说话的态度），我们可以断定：至少在当时，在鲁迅与林文庆之间，并不存在或已爆发十分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因而，鲁迅之离开厦大，实质上与林文庆之间并没有多大关系，就算是有关联，也绝对不是第一位的因素。既然林文庆不是导致鲁迅无法久居厦大的最主要因素，那么，导致鲁迅不能在厦大久留的根本原因又在哪里呢？笔者认为起码有二：

二、导致鲁迅离开厦大的内在原因

让鲁迅不能在厦大久留的首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月亮（许广平）当时不在厦门，《两地书》可以为证。本来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北京时曾有“做两年工作再作见面的设想”，可分开没几天，许广平就首先坚持不住了：“临行时所约的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9月6日，指写信时间，以下同）至于鲁迅，则在前往厦门的船上就开始打听“从厦门到广州的走法”了（14日）。鲁迅到厦门的第八天，学校尚未开学，就盼着“合同的年限早满”（12日），总不能说，鲁迅这时就已和厦大或林文

庆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吧？而此时的鲁迅已然流露出希望合同早满的心情，只能说是他与许广平难分难舍的崇高爱情，是促使鲁迅心生去意的最根本原因。纵观鲁迅在厦门期间的的生活，只能用度日如年来形容：“我之愿合同早满者，就是愿意年月过得快，快到民国十七年，可惜来此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了”（30日）。鲁迅到厦门四十天，就已心生去意：“我现在很想至多在本学期之末，离开厦大”（10月16日）。10月20日，鲁迅还差点儿和孙伏园同船到广州去，但终因鼓动林语堂不成功，且考虑到自己“已收了三个月薪水，而上课才一月，自然不应该又请假”，拿了厦大这么多钱，就连鲁迅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这才不得已打消了去广州的念头。虽说去广州的目的“大部分却是为公”，但鲁迅也不得不承认：“要同行的理由，小半自然也有些私心”，到底为公为私？相信读者自会明白。在风景那边独好的情况下，鲁迅自然是“于这里毫无留恋”（21日）了：“到此刚五十天，而恰如过了半年”（23日）。至此，鲁迅终于做出了决定：“不作长久之计”，“倘无别处可走，就仍在这里混半年。”（29日）不能让鲁迅下决心决然离去的原因，是因为他“怕广州比这里烦劳，认识我的人们也多，不几天就忙得如在北京一样。”（11月7日）至于许广平，则是主动提出要到厦门去：“你愿否我趁这闲空，到厦门一次，我们师生见见再说，看你这几天的心情，好像是非常孤独似的。还请你决定一下，就通知我。”（16日）所有的这一切都促使鲁迅痛下决心：“决计要走了”，本来“时期是本学期末抑明年夏天，却没有定，现在是至迟至本期末非走不可了。……无论如何，年假中我必到广州走一遭，即使无噉饭处，厦门也决不住下去的了。”（18日）决心“从速离开此地”，（25日）因而，“决计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这里，就中大教授职。”（28日）鲁迅开始迫不及待地计算离开的时间了：“计算起来，我在此至多也只有两

个月了”（12月2日），只是因为要等着拿薪水，才迫使他不能立刻离开：“离校恐当在二月初，因为一月份薪水，是要等着拿走的。”（14日）因心急，甚至让鲁迅连离开厦门的时间都计算错了：“我离厦门的日子，还有四十多天，说‘三十多’，少算了十天了”（16日）。离开厦门的日子越近，“算起来只有一个多月了”（24日），心情愈发迫切，希望“能早走则早走”（12月29日）。

以上所言，皆为《两地书》中公开发表的内容，而在“原信”中，尚有大量恋人之间的私言密语，在鲁迅编订出版《两地书》的时候都被删除了。透过“原信”中被删的内容，或许能更好地理解鲁迅之所以要离开厦门的根本原因。鲁迅率先向许广平表白自己的忠贞：“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和HM（许广平）相见”（9月30日）当孙伏园走后，夜晚的整座大楼上只有鲁迅一人的时候，为了排遣孤独，鲁迅依靠“静坐着默念HM，所以精神上并不感到寂寞。”（10月23日）“默念着一个某君，尤其是独坐在电灯下，窗外大风呼呼的时候。”（11月4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默念显然有日益增加的趋势：“何况还有默念，但这默念之度常有加增的倾向，不知其故何也，似乎终于也还是那一个人胜利了。”（12月2日）而一想到即将与许广平见面，鲁迅的颓唐就烟消云散了：“我近来很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大约得力于有一个人的训示。我想二十日以前，一定可以见面了。”（1月2日）鲁迅之所以坚持前往广州，显然是另有它因：“至于中央政府迁移而我到广州，于我倒并没有什么。我并非追踪政府，却是别有追踪。”（12月2日）鲁迅的追踪目标是什么？相信读者自有明断。除了“中大”催促鲁迅很急这个理由之外，促使鲁迅“能早走则早走”的根本因素，“自然另外也还有原因”（12月29日），这“另外”的原因，想必也无需在此明言了。

鲁迅如此，许广平又何尝不是这样？“你能静坐默念○○吗？他也喜欢默念，时间是睡不着和早上醒来为多”。（10月30日）十一月十六日，许广平甚至主动提出要到厦门去看望鲁迅：“你愿否我到厦一次，我们师生又见见再说，依你这七，八，九几天的心情，似乎有一个深了解你的来填一填你的空虚，一否一或者说，另以一杯水，换去一杯酒才能振作起你来，但是，还请你决定一下通知我。”为了能让鲁迅痛下决心早日到广州，许广平甚至故意在信中把广州的情形“说得天花乱坠”（10月23日）。人之常情、常理，试想一下，在那边“乖姑”一声声“嫩棣棣”、“乖弟弟”、“傻孩子”的温柔呼唤声中，只要鲁迅还是个人，他又怎么能禁得住人性的诱惑呢？

相信凡是发育正常、曾坠入过爱河的成年男女，都曾有过“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样的体验，鲁迅和许广平也是人，自然难以抵御爱神丘比特那犀利无比的攻击。两人天隔一方，唯有依靠鸿雁传书以解相思之苦，据陈梦韶《鲁迅在厦门》中的统计：鲁迅在厦门134天，共给许广平写了40封信，平均三天多写一封（有些信虽是作为一封信发出，但其内容却是分时段写的，因而，一封信实际上等于好几封信的内容，也就是说，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实际上不止于40封）。虽然这期间鲁迅也给他人写信多达140封，但相较于信中内容大多为就事说事、三言两语近乎公函式的简短说明，则给许广平洋洋洒洒的每一封信，几乎都算得上是宏篇巨著了，因而，这些信件几乎构成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的短短四个月中，写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文学作品”⁹中的最大一个份额。收看许广平信，是令鲁迅最为开心的事：“得到你六月八日的两封来信，高兴极了。”为了不错过许广平的信，邮务

9 陈梦韶，《鲁迅在厦门》，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年，页21。

代办所成了鲁迅“每日去看的”地方（9月14日），除了“每日自去看一回”（9月25日），甚至连开会时都要“溜出会场，再到代办所一看”（12月12日），平时则借着上厕所的机会一天数次去看信：“我到邮政代办处的路，大约有八十步，再加八十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总要走过三四回，因为我须去小解，而它就在中途，只要伸首一窥，毫不费事。”（9月30日）如此情况下，鲁迅又怎么可能会在厦大坚持两年之久呢？试想，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多情？鲁迅虽然不是少年人了，但爱情是可以使人变得年轻起来的，因而，处于热恋中的鲁迅，有这样的行为、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可以看成是促使鲁迅必然离开厦大的内因。

三、导致鲁迅离开厦大的外在原因

至于让鲁迅不能在厦大久留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国学院内部的人事矛盾，即他与“现代评论派”顾颉刚等人之间的矛盾。这些原本在北京就已产生的旧矛盾来到厦门之后持续发烧，也是迫使鲁迅必然要离开厦大的一个很重要因素。虽然研究鲁迅的学者一般都轻视甚至有意忽略了鲁迅和“现代评论派”之间矛盾的激烈程度，但《两地书》却将鲁迅和顾颉刚等人之间的矛盾暴露无遗：“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所以我现在很想至多在本学期之末，离开厦大。他们实在有永久在此之意，情形比北大还坏。”（10月16日）《两地书》中十余次公开提及顾颉刚（朱山根）的名字：“在国学院里的，朱山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9月20日）“朱山根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9月25日）“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这人是陈源之流，……他已在开始排斥我”（9月30日）；

“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在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但国学院内部的排挤现象，外敌却还未知道”（10月21日）；“山根先生仍旧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画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11月1日）“先前朱山根要荐一个人到国学院，但没有成。……‘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现代’派学者之无不浅薄，即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11月3日）“本校并无新事发生。惟山根先生仍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12月15日），“朱山根已经知道我必走，较先前安静得多了”（12月20日）。这些与鲁迅“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9月20日）这就是令鲁迅呆“在这里不大高兴的原因，首先是在周围多是语言无味的人物，令我觉得无聊。他们倘肯让我独自躲在房里看书，倒也罢了，偏又常常寻上门来，给我小刺戟。”（10月15日）当鲁迅说出“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的时候，就已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的心迹：他是决不会久留厦大的！

从鲁迅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顾颉刚等人的憎恶程度是超出了一般人想象的，他甚至以“敌人”称之，大有不共戴天之意。鲁迅不是只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攻击顾颉刚等人，在同一时期给友人的信中，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态度，譬如，他给川岛（章廷谦）的信中说：“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亦有陈源。……要做事是难的，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从北京来的人们，陈源之徒就有。……有几个人也在排斥我。”¹⁰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慨。因为憎恶

10 “261023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583。

顾颉刚等人，鲁迅到厦大不足一个月，就要辞去国学院的兼职，只是因林语堂的缘故才暂时作罢：“上月因嫌黄坚，曾辞国学院兼职，后因玉堂为难，遂作罢论。”¹¹

由上述可以看出，鲁迅与顾颉刚等人之间的矛盾，是促成鲁迅离开厦大的另一重要原因。尽管鲁迅在书信中明白无误地说出了他与顾颉刚等人之间的矛盾，但滑稽的是，不但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不愿意承认“排挤说”的存在，就连顾颉刚本人显然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至于当厦大学潮爆发后，他还在以历史学家特有的严谨态度，在为学潮的爆发总结原因呢：“厦大的风潮，起于理科与文科的倾轧，而成于鲁迅先生的辞职。”¹²假如让顾颉刚看过了《两地书》后再让他来谈对学潮的看法，相信其结论肯定会大不一样。在《两地书》中，鲁迅首次提及文理科之间的矛盾是在10月23日：“理科诸公之攻击国学院，这几天也已经开始了”，但那时候，鲁迅已是去意已决，因而，倒也乐得坐山观虎斗，甚至大有幸灾乐祸之趣味：“因国学院房屋未造，借用生物学院屋，所以他们的第一着是讨还房子。此事和我辈毫不相关，就含笑而旁观之，看一大堆泥人儿搬在露天之下，风吹雨打，倒也有趣。”（六〇）身为国学研究院的教授，居然说“此事和我辈毫不相关”，足以显示出鲁迅当时“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境：鲁迅的离去，已经不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了！

11 “261004致许寿棠”，《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563。

12 “顾颉刚就厦大第二次学潮致胡适函”，转引自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大校史资料》第一辑，1987年，页281。

四、结论

研究鲁迅的学者为了突出林文庆与鲁迅之间的对立，大都强调鲁迅是因为对厦大的整体不满意而辞职的。鲁迅对厦大浓郁的尊孔气息不满可说是肯定的，但因他没有在这方面留下过多的记录，故无从得知他的确切态度是怎样的。鲁迅致川岛信中的一句话，似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厦大的整体观感：“学校的精神似乎很像南开，但压迫学生却没有那么利害。”¹³我们知道，张伯苓在南开大学施行家长式的治校方式，而鲁迅的上述说词足以显示出：在鲁迅的眼中，厦大的情况至少要比南开好多了。鉴于林文庆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吹和提倡儒家学说，而儒家学说正是基于伦理基础之上的，因而，厦大会显示出一些“很像南开”的地方倒也并不令人奇怪，更何况当时厦大的教授，多是刚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后起之秀，相对于林文庆这个耄耋老者，他身上所散发出的长者的宽厚仁慈，令一些年轻的教授不自觉地将其视为长辈，也自在情理之中。关于这一点，前述《两地书》中关于“校园恳亲会”的记录，可以反证之，而从鲁迅后面所说“还有希奇的事情。是教员里面，竟有对于驳斥他的教员，不以为然的。”可以推断出，林玉霖所表达的意思，在当时绝非仅是他个人孤立的看法，应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学者们之所以喜欢强调林文庆与鲁迅之间的冲突，或许是考虑到林文庆的尊孔与鲁迅的打倒孔家店之间没有任何可以妥协的余地。的确，林文庆尊孔和鲁迅打倒孔家店都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如果仅从思想根源上来看，两人之间的是应该存在着激烈冲突的，但思想上的冲突，却未必然会立刻在行动上表现出

13 “261023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583。

来。从鲁迅的信函中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百余天当中，时时刻刻让他恼怒不已的，是“现代评论派”成员经常给他制造的“小刺戟”：“他们倘肯让我独自躲在房里看书，倒也罢了，偏又常常寻上门来，给我小刺戟。”由于工作上的关系，鲁迅无可避免地需要经常与这些人打交道，而伴随着“‘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膨胀起来”，鲁迅敏感地预测到：“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这才是令鲁迅最为担心和无法容忍的。至于林文庆，虽名义上是国学院的院长，但从资料上来看，他这个院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挂名的，平时并不参与研究院的日常工作，就算是国学院的某些事项需要校方来处理，中间还隔着大学秘书刘树杞，否则，也不至于因刘的从中作梗而引发出诸多事端来了。至于鲁迅，以他的性格，也决然不会趋炎附势去巴结在他看来已被他的敌人包围了的校长！由于鲁迅和林文庆之间缺少直接交流的机会（两人之间的几次接触，基本上是局限于几次宴饮之间，而且大多发生在鲁迅已决定离开厦大之际），这使得两人之间相应地减少了摩擦的可能，因而使得鲁迅在其书信中不止缺少对林文庆的评述，甚至也较少地出现对林文庆的批判，因为鲁迅显然更介意那些包围着林文庆的人。关于这一点，笔者十分认同海外华人史学家王赓武对此问题所做的一个注释：“鲁迅对国学院几乎一开始就持批评态度，但是并不始终责怪林文庆领导无方。他还认为国学院教务主任沈兼士能力不强不负责任，对他的朋友林语堂的行政才干也没有好印象。他的生气，很多时是冲着顾颉刚和他从北京带来的人。”¹⁴

或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幸亏鲁迅在厦大呆的时间

14 注释（22），见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页190。

够短，使得他激进的反孔思想与林文庆的尊孔意念尚未有更多碰撞的机会，鲁迅当时的目光几乎全都集中在“现代评论派”身上了，他实在无暇顾及到林文庆的尊孔言行和他打倒孔家店的目标之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否则，如果他在厦大呆的时间足够长得话，那么，他和林文庆之间更加激烈的正面冲突将会势不可免，那时候，再出现在鲁迅笔下的林文庆，恐怕就远非是“尊孔的”可比了，以他那一贯辛辣、无情的笔触，我们很难想象林文庆在他的笔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或许可以这么说，鲁迅的过早离开厦大，虽然引发了一场学潮，使林文庆遭受池鱼之殃，但对林文庆来说，实在也算得上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林文庆因此而减少了后人附赠给他的更多骂名！

总体来看，鲁迅对林文庆的不满远比不上他对那些包围在林文庆身边的“敌人”的敌视程度：“对面是‘吾师’和‘先生’，背后是毒药和暗箭，领教了已经不只两三次了。”¹⁵鲁迅提到“现代评论派”成员时，其说话的语气和讽刺的力度，都远远超出了他对林文庆的不满程度，譬如，鲁迅对黄坚的嘲弄，简直堪称是经典的讽刺之作：“白果从北京到了，一个太太，四个小孩，两个用人，四十件行李，大有‘山河永固’之意。”（12月15日）这才是鲁迅行文的典型风格。与之相反，鲁迅对林文庆就显得客气多了，甚至在他离开厦门前往广州途中的《海上通讯》中，都依然秉持了一贯的客气：“校长林文庆博士是个英国籍的中国人”，这与“陈源之流”、“朱山根之流”的称呼相比，难道还不足以看出鲁迅对林文庆的真实态度是怎样的吗？很显然，

15 鲁迅，《海上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419。另：《两地书》一〇九：“连白果也称我为‘吾师’了”。

林文庆和鲁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并没有以往人们所想象中的那样严重，退一步讲，就算是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冲突，也并不是以往人们所认定的那样是思想观念上的对立与冲突，而是集中在国学研究院内部事务及其人事上的纠纷，后来更因学潮即将爆发，谣言满天飞，在无法分辨谣传真假的情况下，鲁迅显然是不自觉地选择了相信谣言的真实性，这就必然导致了他对林文庆的不满情绪呈逐渐增强的趋势，这一切都是可以从鲁迅著作中对林文庆仅有的那点儿记载中反映出来的。显而易见，鲁迅离开厦大，与林文庆并没有多大实质的关联，如果因此误解以至于影响了后人对林文庆的正确评价，那么，这对林文庆来说，也是极不公平的。至于妄言与夸大鲁迅与林文庆之间的矛盾这一说法，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

（责任编辑：潘碧华）

The Misunderstood & Exaggerated Pseudo-proposition

– Research 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Lu Xun and Lim Boon Keng
from Lu Xun' Letters and Diary

Yan Chunbao,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Lu Xun only spent more than one hundred days in Amoy University, however, he left behind a series of bewildering historical puzzles. Such a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he and Dr. Lim Boon Keng, the president of Amoy University at that time, which was a question which plagued scholars for long time. However, it was an artificially exaggerated problem. Actually, there was no violent conflicts between Lu Xun and Dr. Lim as imagined by scholars. Moreover,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causing Lu Xun to leave Amoy has nothing to do with Dr. Lim Boon Keng. Hence, the leaving of Luxun from Amoy University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that fishbone stuck in the throat in our evaluation of Dr. Lim Boon Keng.

Keywords: Amoy University Lim Boon Keng Lun Xun
Thought conflict.